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9）

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上卷（9）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科举制度

选人任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但由于具体的时代差异性，选人任官的制度与措施在各个时代是有所不同的。总的说来，隋唐以前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则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

所谓科举制度，乃是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封建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官吏的一种制度。它发源于隋朝，完备和兴盛于唐代，宋代更为发达，衰落于明代，一直到清末始废除。它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于我国历史上达 1300 多年之久。这期间，它曾利国、利民、利朝廷，也曾误国、误民，最后也挽救不了自身之灭亡。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缘由的。科举制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会产生，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需要它，用它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使其王朝长治不衰。隋文帝杨坚作为一个开明的封建统治者首推科举制，开创了选官用人的新局面，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二是隋朝之前社会经济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日趋复杂。南北朝后期，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他们对门阀世族地主的政治垄断日益不满，要求参与政治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兴的王朝就不能不考虑这部分人的要求，否则，江山不牢。同时，世族门阀势力过于庞大对最高统治者也是很大的威胁，他必须重建一种制约力量。封建统治者已别无选择了。科举制就这样以崭新的面貌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三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它人为地压制摧残优秀人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为世人所唾弃。对于这个腐朽的用人制度，新兴的隋王朝只能弃之不用，另辟蹊径。四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分科考试、择优录用的选仕方式已初露端倪，显示出潜在的蓬勃生机。统治者当然会择善而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封建统治，在政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在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空前的大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再度重新确立，封建国家机器开始日益完备起来，这就需要大批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为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隋统治者另辟道路，尝试采用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在隋朝尚属开创阶段，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而且在隋统治的 30 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然而，隋统治者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备。在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 627 ~ 655 年），它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典型。

唐朝初建时，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曾实行过“九品中正制”，然而它分散了朝廷的权力，滋长了豪门势力，给封建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不久便被废除，转而走科举考试之路。

唐高宗以后，要求做官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时的科举取仕数量比过去增多了，由科举入官的人的地位也提高了。武则天当政后，在

选人任官方面采取了放宽仕途、扩招人数的政策。她曾下令，官吏和百姓都可以自荐做官或升官。她亲自接见所有被举荐或自荐之人，让他们一律试做某官，当时称为“试官”。武则天还多次举行制科考试，并且创立了武举科，亲自在洛城殿考贡士，开创了皇帝殿试的先河。这些措施使科举考试制度得到很快发展。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科举选仕的规模又趋扩大。这时盛行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入仕，尤其是以进上获得要职的人越来越多，对凭借门第荫封取得官位的权贵子弟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在唐朝中叶，两种官僚集团各自结成朋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长达 200 年的权力纷争中，双方的成分也是相互转化的，科举出身的人掌权时间长了也可能变成官僚贵族。有些人为了顺利地通过科举之路获得官职，纷纷投到权贵门下，而朋党双方也借此机会拉拢这些举子，发展自己的势力。每次科举考试之后，凡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把他奉为“座主”，自称是他的门生。同一期考取的考生互称同年。这些人很容易结成一党。朋党之争是中小地主和大官僚贵族在权力的金字塔上争夺地盘的斗争，科举制为这一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因为大官僚贵族的反对，这个时期的科举制举步维艰。

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的来源有二：一是生徒，即指朝廷所设立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教育部门主管的各类学校毕业的学生；二是乡贡，即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学生，也就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报考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间，这时正值槐树花季的末期。当时就曾有这样的谚语：“槐花黄，举子忙。”宋朝著名诗人也写过“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的诗句。

报考的办法是，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都可以通过校内考试，挑选所谓学业有成者，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凡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则由国子监祭酒挑选，凡地方郡县的生徒，则由长吏挑选。即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而志愿报考的知识分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史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的省试。

国家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参加省试以前要先经过预选，预选合格者被送到中央来参加省试。据历史记载，省试时，考生们要自带水、蜡烛、餐具等，被点名后方可进入考场。考场用草席围隔、并有兵士守卫。进场时要进行人身搜查，以防作弊。如果搜出书文，不管多少，一律驱逐出场，并且罚两次不准参加考试。试卷有时糊名，有时不糊名。考试的时间有限制，白天一整天，天晚后燃尽两三只蜡烛就要交卷。有诗记述当时的情景：“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指尚书省）风月画难成。”又有诗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如果考生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在试卷上写上“对未审”三个字。改卷时，对回答正确的问题就批一个“通”字，对错题或不答的问题，就批一个“不”字。

在唐初，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有限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每年约百人左右，进士科则不过一二十人。唐代 200 年间，登进士者仅有三千余人。贞观十八年（公元 644 年）开始对录取名额作了明确规定。此后，对于每年的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

凡是省试落第的人都可以进国子监学习，以伺再试。有的就留在京城，

复习作文，伺机呈献给公卿权贵，以求得举荐、通过省试即为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元”或“状头”。同时考取的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都是他的“门生”。然而，得了进士并不就一定有官做，它只是一种身份，只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考中者才授予官职。通不过这种考试的人称为“前进士”。“前进士”若得权贵向朝廷保举也可做官，克部的考试称为“选试”，又称“释褐式”。它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先考书、判，看其书写是否工整遒美，文理是否通顺流畅，然后试身、言，观其体貌是否俊伟，说话是否清晰，通过这四项者即可授官。

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而且唐代科举考试在不同的时期设立的科目不尽相同，随时有增有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常见的有：一、秀才。依照规定，秀才科须考方略策五道，按文理通顺程度分四等录取。以秀才身份做官的，分四等授于官职，分别为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品下。然而此科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被废止了。二、进士。开始时只考时务策，后来加考帖经和杂文。帖经又称帖文，是把经书前后两边都遮盖上，中间只留一行，再把一行中的任意三个字贴住，考生把这三个字读出来。杂文是指箴、铭等。唐玄宗之后，又把诗赋列为必考项目。进士按成绩分甲第、乙第两等。取得进士身份的可能授以官职。甲第授九品上之官，乙第授九品下之官。三、明经。明经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孝经》、《论语》是所有参加科举的人都要掌握的。本科也考时务策，明经科的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与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官职。四、明法。是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五、明字。主要考《说文解字》、《字林》等，属于文字科。六、明算。属于数学学科。主要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七、诸史。一史指《史记》。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属于史科，唐穆宗时设立。八、开元礼。考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的礼仪制度。九、童子科。10岁以下，只要能熟通一经以及《孝经》、《论语》的儿童均可参加此科考试。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诵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十、道举。本科只在唐玄宗时实行过。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十一、制科。这是皇帝特招的知名人士举行的考试科目。其中又可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名目。考试日期和项目都由皇帝临时决定。一般要考时务策，玄宗后加试诗赋。制科考试优等的可得到较高的官职，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十二、武举。上面已经谈到，武举由武则天创设。由兵部员外郎一人主持考试，分为平射、武举二科。须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等，也考其语言，观其身材。武举在唐代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止了。以上各科中，考明经、进士的人最多。

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到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唐代实行科举考试，确实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唐朝贞观初年，曾经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士的情况。在发榜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

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到了北宋，在选拔人才方面也因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更为发达。

北宋时期科举考试的生源基本上与唐代相同。北宋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起初是皇戚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国子监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后来国子监允许成绩优异、有本乡官员保举的外地人进入学习。第二种生源是地方上经层层考试选拔出的优秀书生。

北宋的考试科目也有十几种之多，有进士科、制科、词科、武举、童子、九经、五经、三史、三礼、开元礼、学究、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进士科。

词科的设立，是宋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特色。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词的鼎盛时期，宋词与唐诗并称。究其原因，这大概与宋代科举考试中词科的设立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的科举考试过程以进士科最为完整，它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

州试时，进士科由州之通判主持，其余各科由录事参军（州长助理）主持，考卷用红笔批阅，回答正确的写“通”，答错的写“不”。考官和监考官要在试卷末尾署名。被录取的考生称为“举子”、“贡生”，冬季要到中央尚书省集合，以待省试，举子们须将自己的籍贯、家世、年龄及参加考试的次数如实向礼部汇报。他们要有十人担保，如果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违反科举规定，考生即被取消考试资格，保人也要受连坐，也就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的要负连带责任。宋代规定，凡高祖以内有犯死罪者、不孝不悌者、商人、还俗僧人、道人、残废人都没资格参加考试。

礼部在春季举行省试。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多由翰林学士、六部尚书担任。考生入考场不得挟带书籍，考场内不准交头接耳。如果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驱赶出场，下次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省试在白天进行，改变了唐朝以来夜以继日、燃烛考试的做法。进士科的考场待遇比其他科好，有座位、有茶汤，其他科的考生没座位，多伏在毡席上答卷，也没有茶汤供给，考生实在渴了，便只好喝墨水，弄得黑嘴花脸，狼狈不堪。宋代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的做法，在职的官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可以不参加州试，直接参加省试。

省试通过以后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宋代殿试的先例是宋太祖赵匡胤开的，这次参加殿试的进士及其他各科及第者有 28 人。以后逐渐形成了制度。皇帝之所以要亲自主持殿试就是为了避免考官和考生建立特殊关系，结党营私，危及他的中央集权政治。

殿试的时候，殿的两厢挂帷帐，设座席，上面写有考生的姓名，在考试前一天，在宫墙外发榜公布入场次序。第二天考生们依次入场，对号入座。试卷答完后交给宦官，由宦官转交给编排官，揭去卷首的籍贯、姓名，编上号码代替。然后编排官再交给封弥官，由封弥官誊写校核，加盖御书院印章后送给考官批改。批完的试卷要将评定结果密封起来，交给复考官再次评定。最后由编排官检阅两次评定，假如两次评定的差别很大，还要进行第三次批阅。如果评定结果仍有悬殊，就以相近的两次评定成绩为标准确定最后成绩。然后对应编号和姓名，并按成绩分成等级。各等级的名册及试卷都要报皇帝审批。可见殿试的程序够细致的，也够繁琐的。殿试成绩分为五等，这五等进士分为三甲：一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

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皇帝将三甲进士的名单确定后，便派人在殿前宣布，称为“临轩唱第”。尔后皇帝还要赐给及第者绿袍和笏板。第一名归第时，朝廷派仪仗队开路，风光非常。同时，考中者还要按名次出钱，举行庆祝活动，摆设“闻喜宴”。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相比，录取名额比以前扩大了，被录取人的待遇也提高了。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不过二三十人，宋代扩大到二三百人，甚至更多。宋太宗在位 21 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代经过省试、殿试者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成绩优秀者还可得高官。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

除此之外，宋代考试程序进一步严格。

为了确保人才的质量，防止弄虚作假、滥竽充数，宋代科举考试，从乡贡到殿试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有相应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第一，规定名额、谨防滥举。州试的录取比例大约为 1%，省试稍高。第二，重视举子的体质，禁止举荐残疾人。如果发现这类人，不准送到中央，吏部也不能接受。第三，实行“互保连坐”法，防止冒名伪荐，假如发现不合规定的举子，即送回原籍，保人永远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第四，专门设立“别试院”，以隔离考官子弟与其亲属。第五，实行“锁院”制度，防止泄秘。考官一经任命，便立即停止原来的工作，搬入贡院（一般举士的考场）办公，同时封锁消息。考试结束后考生退出考场，再次“锁院”，在秘密状态下阅评考卷。第六，采取糊名誊卷法，防止舞弊。这些措施的实行，基本上保证了考生及被录取者的质量，是行之有效的。

南宋的科举考试，大体上与北宋一脉相承，仅在一些枝节上有些变动。

元代，科举制度很不发达，远没达到唐宋时水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身游牧民族的元朝统治者文化水平较低，认识不到文人的重要作用，他们只认为能征战的武夫才是人才。他们对科举制度不重视，因此压抑、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后来有所转变。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 1315 年）才正式开科取士。

元朝的科举考试与唐宋相比，加入许多民族歧视性的东西。

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分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乡试由中书省派驻地方的执行机构行中书省主持，录取 300 人。乡试取中以后，再到礼部进行会试，会试取 100 名。然后就进行御试，御试录取五六十人到八九十人不等。被录取者也分三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六品官；二甲进士授正七品官；三甲进士授正八品官。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它把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其中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其中包括契丹、女真和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即长江以南的汉人及西南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歧视政策也表现在科举考试上。在进行各级考试时，一二等人都和三四等人分开。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和南人则要考三场。御试时，即使同考策问，但一二等人写 500 字就可以了，而三四等人却要写 1000 字。考试内容的难易也不一样，蒙古人、色目人的题目比较容易，汉人、南人的题目则较难。前两等人如果愿意参加后两等人的考试，考中后可以比汉人、南人高一等授官。

明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专制的集权，对科举制也进行重大改革。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其创立基业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

性，所以他很重视人才，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明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就开了科举，可是朱元璋看到科举得到的人才中有不少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难以胜任，就一度停了科举，实行荐举取仕，几年后才又恢复科举考试。为了保障人才源源不尽，朱元璋在实行科举制和举荐制的同时，十分重视兴办学校。中央设立国子学，生源是宦官子弟及乡下成绩优异的书生。除此之外，各府、州、县也都兴办学校。这时的科举考试在内容上日趋腐朽，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被规定为学校的教材和考试内容。作文的形式也趋死板，严格要求以八股文的形式，扼杀了创新，这就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使像《本草纲目》这样的世界医学名著当时也不被承认。同时，这一时期的科举取士程序也变得更为严密、繁琐。科举制度的优越性逐渐丧失了，因而日趋没落。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历代相比大大减少了，只有进士科、武举科，不过，武举科并不景气。

明代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

明朝的正式考试分为四级：县试、府试、会试和殿试。

县试与府试。明代科举每三年一届，每届从基层贡举为起点。县试、府试都要由知县、知府亲自主考。县试优秀者送至府，进行府试，考中者被称为生员（即秀才）或相公，考不中者称为童生。府试后再选优秀生进贡给省。中了秀才就脱离一般平民，进入了统治阶级的圈子，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跪，官府也不能对他随使用刑。

乡试。乡试是各省面向生员举行的科举考试，在各省省会进行。乡试三年一次，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时值秋天，故乡试又称“秋闱”，共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礼乐论述，第三场考经史时务。三场考试都合格者，10天后再面试骑、射、书、算、律五艺，看其知识面的大小，面试通过者按名额录取。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举人不仅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会试，而且可以做官（以知县为主）。

会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举行，相当于唐宋时的省试。参加会试的是全国各地的举人。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的春季二月举行，因此会试又被称为“春闱”或“礼闱”。录取名额一般是三四百人。被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的考试内容与乡试相同。考试时，试卷之首须书写三代姓名、籍贯、年龄等，并要有官府印记。半夜入考场，入场时要搜身检查，然后每人给三只烛进入考房。试卷糊名、弥封。考生用墨笔回答问题。答题时必须避讳皇帝的名字庙号。

殿试。明代国家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便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一般在会试的三月初举行。被录取者称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三人（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每届录取人数不定，一般为100人左右，一甲的3名进士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可以参加翰林院的“馆选”，考取后授重要职位，如果考不取，可以授给御史、六部主事、知州、知县等官。

明朝科举制度的保护措施也与前代不同。第一，正式官吏和已经科举入仕者不能再参加科举；第二，凡罢免的官吏及倡优之流不在允许范围之内；第三，落选者不得喧哗取闹，纠缠考官；第四，考官不得徇私情。以上违反规定者一经查出，就予以除名。

与前几代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朝的科举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过程更加

复杂。自县试到殿试细分成五级，这种繁琐的考试程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耗费了无数考生的黄金年华。有的人皓首穷经，到花甲之年才弄个一官半职。“六十魁天下”，“七十致仕”的人屡见不鲜。第二，考试内容庞杂。不仅考经义，而且更考朱熹的集注。笔试后还要面试度“五艺”。考试难度增大了。第三，有一套较完备的保障设施。第四，生源更加广泛，甚至有外国人参加。如洪武四年就有6名高丽人来应试。

清朝，已处于中国封建制度的逐渐崩溃阶段。它也一直实行科举制度，从皇太极即位一直到20世纪初。

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朝。考试程序、录取原则、授官方式及考试时间大体上一样，只是在长期的推行过程中，细则更多，内容和格式更加僵化、死板，到晚清时已成为众矢之的。

清朝的科举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考试贴诗。自院试到会试都要考，这是一种形式古板，内容呆滞的诗题，必须严格以题而作，以韵而作，不能随意抒情言志，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空洞无物。第二，重书法。八股文本来就贫乏空洞，加之清朝大兴文字狱，文章的内容可想而知。在考官难以用内容评定成绩的情况下，就想出了新招，以书法的优劣评定成绩。就连皇帝也难以例外。这说明科举制此时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第三，用官话。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音多，如果官员们没有统一的官话，对工作十分不利。所以，清帝下令科举考试要考官话，即北京话。在不少地方设立了正音院，教授官话。这项措施对促进中国语言的规范化，加强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既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时期，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时期。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科举上八股取士，大力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明、清两代都采用八股文体的考试作文形式，因而，在这里有必要对八股文作些简单介绍。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或“时文”等，因其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四书文”。它有周定的格式和一系列严格规定，文章开头是破题、承题，接着是起讲、领题（入手）、提比（起股）、中比（中股）、后比（后股）、束比（束股）、落下等部分。破题共两句，点破题目的中心意思；承题三句或四句，进一步说明中心意思；起讲是概述全篇，为议论的起点；入手即起讲后的入手之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是正式议论，其中中比是全文的重心。因为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对偶的文字，总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每部分间由固定的虚词连接，如“今夫”、“也乎哉”等，以至于每部分多少字都有规定。八股文多以四书五经上的一句话为题，句子短的称小题，句子长的称大题，不同级别的考试考题不同。

八股文是封建统治者实行奴才统治的工具，它扼杀了人的智慧，钳制了人民的思想，使无数的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钻在经书中，他们做了官后，就成为统治者的忠实奴仆，他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因此，八股文一直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抨击和诅咒。

清朝科举制的弊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考试程序太繁琐、复杂。自县试到殿试，要经过六次考试，使考生一年四季处于考、考、考的紧张状态中，疲于奔命。浪费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时光，六七十岁的举人、贡士，八九十岁的进士屡见不鲜。第二，内容陈腐，着重四书五经、朱熹集注。虽然

清末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增考中国历史、政治及世界各国的政治，废除八股文，可是仍保留了四书五经的封建内容，即使这样，这种改良也因光绪帝被幽禁，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产了，这种考试内容束缚了考生的思想，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性，使天才得不到发挥。例如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戴震就被拒之于进士大门外。第三，八股文风日盛日昌，泛滥成灾。考生们为遣字排比、拼凑对偶而咬文嚼字、挖空心思，考不出水平，发掘不出真正的人才。第四，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绝境。下自县令、上到宰相无不为之。第五，考需脱节。考试内容只在故纸堆中打转转，长期脱离实际需要，使不少新官难以胜任。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挑战，与西方相比，清帝国明显地衰老了，改革势所必然。在全国上下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中，慈禧太后不得不于 1905 年 7 月宣布废除科举制。至此，在中国历史上盛行 1300 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了。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清朝存在的同时，南方曾存在过一个相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它有别于以往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过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自太平天国 1853 年定都天京后就正式实行了。它分为县试、省试、京试三级，分别相当于清朝的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分文武两科取仕。京试后改为天试。同时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都举行京试，称为东试、北试、翼试。这四种考试分别在四王的生日所在月份举行，因此一年之中有四次京试。后来规定每三年科考一次。

太平天国的考试内容为诗和策论，废除了四书五经，改考《天命诏旨书》、《新旧约》等太平天国典籍。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不论出身贵贱都可报考，体现了平等、人道精神。做官者也可再考，考中者受提拔。考试的录取标准较宽，录取名额也多。这些制度对选拔人才、巩固革命政权都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前代科举制的称谓，县试考中者称秀才，省试考中者称科举人，天试取中者分一二三甲，一甲 3 人，称状元、榜眼、探花。同时，太平天国在科举考试中仍因袭清朝八股体作文、试贴作诗的作法，与其提倡的朴实、明朗的文风相矛盾。这些又折射出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彻底性。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作为一种选举制度——科举制度也对世界的文明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从元朝开始传向邻邦和西方。元朝政府曾任用少数外国人做官，这些人后来返回祖国后，就把熟悉的中华文明向本国政府介绍。科举制度由此传入西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做了 17 年官，十分了解中国的官场和官吏选拔、任用制度。他回国后把在中国官场的见闻整理成书，扩大了中国文明的影响。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继续西传，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籍不断增多，《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札记》等著作广泛宣传了中国的考试取仕制度。英国有不少人竟呼吁本国政府仿照执行。1855—1870 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的科举考试给成长中的英国文官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机会均等的原则逐渐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美国的文官制度也参照了中国的科举制。因此

西方人把中国看成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是有历史根据的。

只要有考试，就必定有作弊现象，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科举考试中的奇怪现象也就多种多样。

科举考试产生以后，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预防作弊，例如糊名、搜身、誊录、磨勘等。可是作弊现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代考、传递卷子、割卷、贿买、挟带等。割卷就是考官在改卷时调换卷子。挟带一般是用极小的字体把四书五经抄在薄如蝉翼的纸上，然后把它藏在笔管里、鞋子里或砚台底部。有的写在衣服上。现在的故宫博物馆里有一件袍子，衣底用芝麻大的字抄录了十三经。有的用药汁作墨，把书抄在青布衣上，上面涂上泥巴，入考场后将泥巴揉去，字就露了出来。还有的贿赂考官，将书籍文章事先藏入考场。由此可见，有些举子为了功名利禄，真是煞费苦心，想尽办法。然而，历代科考作弊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各种各样的贿考了。唐玄宗年间，杨国忠任宰相时，他的儿子杨暄参加科考，成绩不合格，礼部侍郎达奚珣不想录取他，杨国忠知道后怒不可遏，大骂考官，达氏畏惧其权势，只好录取了杨暄。再如，明朝著名太监刘瑾，在一次会试时把一张 50 多人的名单交给考官，让其录取，考官不敢违抗，只好照旨录取。有的考官因没处理好这个关系，掉了乌纱，丢了性命，也有的考官因此得以擢升。

下面就是一例典型的科举考试中的舞弊案。

康熙五十年（公元 1711 年），江南乡试的正副考官左必蕃、赵晋勾结两江总督噶礼，大量录取盐商子弟，收取重贿。因此，考生哗然，千余人聚集起来，把五路财神像放入府学，并且作诗讽刺之。有一幅对联这样写道：“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隐讽两位主考官。有人用纸把贡院的匾糊上，将“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总督心虚，来个恶人先告状，把为首的闹事考生缉拿入狱。此案几经周折，康熙帝多次亲自过问，最后才弄清真相。结果是，噶、左被革职，赵晋被杀头，这一舞弊案在当时震动很大。

清朝咸丰年间，盛行“递条子”的舞弊办法。考试后考生向考官偷递纸条，写明答卷内何处有记号，当然递条子之前先要递上别的东西。后来，递条的方法又有改进。在纸上画上圆圈，一圈表示 100 两银子，五圈就暗示若被录取，赠银 500 两。

其实身为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他们也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或是故意破坏科举结果。

有的皇帝以貌取人、甚至荒唐到以名取人的地步。明朝建文二年（公元 400 年）殿试，按成绩王艮应为状元，由于其貌不扬被降为第二名。正统四年（公元 1439 年）殿试，张和因眼有毛病被降到二甲。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 年）殿试，孙曰恭理应成为状元，因其名字“曰恭”合起来似“暴”，把他降为第三名，把邢宽升为第一名，表示刑法宽松，喻其仁政。还有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殿试，本来应该把吴情定为状元，因“无”“吴”同音，皇帝认为此人“无情”，便把他降到第三名。定名时，由于皇帝老见殿中的帐幔被风刮成“雷”字，就寻找名字中带“雷”的人，结果一个叫春鸣雷的被鬼使神差地定为状元。

牛李党争

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官僚集团，由于政治利害冲突而分成不同的派别，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勾结在一起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朋党”，他们之间的斗争便称为“朋党之争”。唐代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宦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由于两派的首领分别姓牛和姓李，所以又叫做“牛李党争”。这场争吵很厉害，从唐穆宗时开始，一直争到唐宣宗末年，一共延续了40年的时间。所以唐文宗对此非常苦恼，曾经感慨地说：“要除去河北境内的反贼很容易，可是要除去朝廷中的朋党真是太难了啊！”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李德裕出身世家旧族，他父亲李吉甫是前任宰相，对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他曾经说：“朝廷大官要用公卿子弟，因其从小熟悉典礼规矩，不须教习。寒士即使才学出众，登第之后，一样样都得从头学起，不会十分娴熟。”

由于李德裕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以对于这次漫长的朋党之争，到底在争些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得到错误理解，认为是在争出身的高低。以前就有不少学者说，牛党的人非常重视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由此看来，牛党要比李党进步一些。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李党虽有门第成见，这是习惯势力造成的。李德裕办事，比牛僧孺要取得多。牛党多靠座主（主考官）、门生（考中的进士）、同门的关系，结成一伙，然而已经上升为大官僚地主，他们与李党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矛盾，争权势，争剥削利益，很少有别的原因。

首先，牛李两党的双方都是由出身复杂的官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官僚世家的后代。拿所谓的中小地主出身的李党来说，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孺集团中，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珣、杨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琮、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从出身上来解释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肯定是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再说，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他们的政治集团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当然，李德裕确实批评过进士科的浮华，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中的弊病。唐文宗时李德裕曾建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因为善于吟诗作赋的人不一定能经邦济世。他认为呼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是一种互相勾结的恶习。李德裕执政时，取消了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他这样做，既可以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互相勾结，又能克服春宴花费万钱的弊端，使中小地主避免由于贫穷无力举办宴会而“苦于成名”的困难。李德裕的这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

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从唐宪宗开始，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六个朝代，两个集团之间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都是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当时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的态度上的矛盾冲突。

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牛、李两党对藩帅自擅、叛乱所持的政见是泾渭分明的。唐宪宗（806—820年）统治初期，李德裕父李吉甫任相期间，就力主限制藩镇。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时，由于“吉甫密赞其谋”，才使宪宗决定“诛讨之”。不久，又因李吉甫的建议，平定了镇海节度使李锜的抗拒。唐德宗（780—805年）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李吉甫任相后，一反德宗时的政策，一年之内，调换了三十六镇的节度使。把那些终身不易演成世袭的藩镇逐步撤换，这确实是抑制藩镇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藩镇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对稳定国家政局，保持国家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接替父职，李吉甫主张趁这个时候夺取吴元济的兵权。这一建议正符合唐宪宗的想法，于是宪宗正式下诏讨伐淮西叛乱。可惜未等正式开战，李吉甫在这年10月便去世了。由于李吉甫执政时期坚决打击藩镇，所以后来牛党攻击他说各种滥用兵力所造成的祸害，都是由李吉甫引起的。裴度执政以后，继续打击淮西的吴元济，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喜欢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执政时，他支持李吉甫的政治主张，积极准备，组织大军继续讨伐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势力。当时牛党成员李逢吉坚决反对这么做，怕他取得成功，私下里一个劲地诅咒裴度，希望他早一点失败。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元济。至于牛僧孺，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孺，他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80多万缗，实际没得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孺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唐太和九年（834年），幽州的军队又准备把主帅杨志诚赶跑，再推举史元忠为帅。对这种带有明显叛乱色彩的举动，牛僧孺照样不闻不问，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可见，牛、李两党对于藩镇割据的态度，是有根本分歧的。分析两派的不同态度，李党显然比牛党进步。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各个政治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牛僧孺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唐朝之后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

局面，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笔帐，与牛党纵容唐末藩镇割据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不一样以外，牛、李两党的政治改革观点也不一样。

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孺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就算是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唐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精简京官 1769 名，外官 808 名。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一千余名。事实非常明显，精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又增加到 383 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两党也一直互不相让争斗不已，有时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即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牛党同意的，李党必定坚决反对，根本不考虑原因和后果；反过来李党对牛党也是一样。

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党相反，大中元年（847 年），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简单讲了一下牛李两党的分歧所在，其实他们的分歧很多，很难一下子讲得全面而清楚。

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过程也相当漫长，前后 40 年，经历了六个皇帝。要讲清楚也不容易。简单地讲，两党之间大致经历过五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808 年），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是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孺、李宗闵因为敢于批评朝政，并向朝廷提了很好的政治建议，而被选为上策，即甲等考生。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哭着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其实，对待科举制度，李党一直都很反感，而牛党则一直非常支持。由于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大大地改变了官员中的成分。由科举出身的一部分庶族地主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在朝官中形成了新的集团势力。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与主考官称为门生与座主。他们互相提拔。如唐代宗时（762—779 年），宰相常袞当权的时候，他的手下人甚至大部分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凡是未经科举选拔的人，都无资格当选为官员。可见牛党重视科举的程度。再比如牛党头目杨嗣复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升上来的人，很像现代的同学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在官场上也是互相提拔，互相照顾，很快便形成了小集团。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使得专以门第而任官的社会风尚日趋衰落，世家旧族在政权中逐渐失势。

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僚和世家旧族之间，由于存在着出身和门第上的区别，由于存在着对权势和剥削利益上的争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牛、李两党就是这两种不同派系的代表。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是两党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李德裕出身于公卿宗室，连皇帝都说他的家“一直都是豪门大族；在朝廷上连着父子两代都当上了宰相，一连六个皇帝执政时都被封为侯伯的高贵爵位，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的大家族啊！”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李德裕本人也非常骄傲，他是通过世袭父亲的职位才做上宰相的，所以他很讨厌科举制度，平时甚至连跟科举考生讲话都觉得是一种很难堪的事情。他曾经在武宗面前直接了当地讲“在朝廷里当大官的人，我认为都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子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很熟悉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那些朝廷上的礼仪，礼节和规矩，他们从小就学会了，根本不用再教了。可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呢？即使他们之中有那么一些出色的人才，可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还是得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怎样治理国家。所以，朝廷中的大官，应该用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李党的另一位得力干将郑覃，对科举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陈后主、隋杨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任用了太多的出身寒微的士人。

其实李党这些反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当时已经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得弊端很多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着录取权，许多高官显贵给考官送礼请托，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子弟。一旦考上之后，那些考官又把这些新考中的进士拉到自己这一派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经常录取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当官，影响了朝廷政治事务。所以李党的人要攻击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的第二次大斗争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那一年科举考试时，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另一个小官杨汝士主持。李党的成员李绅和段文昌暗中请钱徽在考试时照顾一下自己的亲戚朋友，钱徽表面上答应了。可到张榜公布时一看，李党成员的子弟一个也没取上，倒是牛党成员的子弟录取了不少。于是李绅和段文昌上诉宣宗，揭发钱徽营私舞弊，录取的人大都是走后门的人。唐穆宗征求李党首领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唐穆宗对这次科举有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负主要责任者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这是牛李两党斗争的表面化的开始。从那时起，两党便明目张胆地开展斗争，再也不掩盖自己对对方的敌视情绪。

被贬之后，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第三次斗争是在长庆三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逢吉执政。他一掌权，便提拔牛僧孺为宰相，而把同样有资格做宰相的李德裕赶出首都长安，到南方浙江去当一个地方官“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便不再提拔他，一连8年都没给他调动职务。对于李党的其他一些人员，牛党也同样压制排挤，一时间

朝廷上下都是牛党的人员，李党的官员要么得不到提拔，要么被贬到外地去做官。这样一来，牛李两党的矛盾就更大了。

但是牛党不可能永远得势。到唐武宗执政的时候，李党领袖李德裕终于回到了长安，当上宰相执政了。他当然不会放过牛党的成员。找机会好好整治他们一番。于是第四次牛李党争便出现了。

李德裕入朝执政的时候，牛僧孺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受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闵任太子宾客分管东部。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孺、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即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60天之中，连续贬了三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

唐武宗时期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李德裕执政，李党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他趁机开始贯彻打击藩镇割据的策略，讨伐刘稹叛乱，收复了泽州、潞州一带地方。牛党虽然反对用兵讨伐藩镇，但此时由于无权，也只好作罢。李德裕打击藩镇割据的做法，比牛党的姑息养奸要进步得多。

当时唐武宗因为全国佛教寺庙太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青年男女去当和尚、尼姑，也减少了许多劳动力，下令拆寺庙，让和尚、尼姑还俗。李德裕很支持武宗的这一做法。这也是他比牛党官员高明的地方。

但是李德裕对儒家学说却崇拜得要命。他主张天命论，攻击那些无神论者是喜欢混乱欢迎灾祸的人。在他家里，没有一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大诗人白居易写的诗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说：“这类诗词曲赋的书既不能安邦又不能治国，读得多了反而让人心神不定做不成事。”但是他的家里却到处都放着儒家学说的书籍，他总是用儒家学说来教训手下人和自己的亲人。跟李德裕一样，李派的郑覃也是不懂诗词，不会做文章，却单单崇拜儒家学说。他上书武宗，要求动用大量国家钱财刻一部石经，即把儒家经文刻在一块块的石板上。他说：“由于长期的转抄，儒家经典已经出现了许多错误，应该请有学问的人来校定六经，改正错误，把经典刻在石板上，存放在最高学府太学里。以便作为后代的正确样本来学习。”当时宦官专政，各种政治事务都非常混乱，人民生活也很苦，国家财政相当紧张，郑覃却不顾这一切，一下子就花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力来刻《石经》，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在节约民间财力、努力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以便增强国力方面，牛党要比李党做得好一些。

不过李党在维护唐朝的政权统一方面，的确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还在文宗当政的时候，李宗闵通过拉拢宦官，当上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

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就坏了大事了。”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对于李党的天命论思想以及崇信儒家学说的做法，牛党坚决不同意。牛党的杨嗣复、李珣在跟李党的郑覃辩论时，曾尖锐地指出：“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最相信天命论，结果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幸亏以后他改了不少，才又使国家重新安定下来。”李珣也说：“相信天命的做法，只能在国家大乱的时候才能采用；现在国家太平，应该重视人才的作用。”这些观点反映了牛派的改革观点。当时曾经做过牛僧孺的幕僚的杜牧是牛党中比较有改革思想的人。

杜牧写过《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章，是他要求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战斗论文，而中心就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求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

即以《罪言》来说，主题是要求唐朝的统一，削平藩镇割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杜牧指出，主要应该看法令是否修明；是否任用贤能，除去奸人；农、战二者是否有充分准备；要是将唐朝本身的法令、人才、农、战这四者都搞好，就一定能打平藩镇，达到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上策。中策是先取得强大的魏博镇，下策“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乱打一阵，毫无效果。

从杜牧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到了后来，牛党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与藩镇割据作斗争了；他们要求朝廷进行改革，用实力削弱藩镇的势力，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征伐藩镇。可以说牛党的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无论是出身门阀士族的李党还是科举出身的牛党，他们都是统治阶级，都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如李德裕在洛阳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平泉庄，牛僧孺从扬州运回许多“嘉木怪石”到洛阳，建成了华丽第宅。这些都是残酷役使劳动人民而成的。至于两派的争权夺利之争，就更加加深了农民阶级的痛苦，激化了阶级矛盾。

牛李两党第五次斗争是在唐宣宗时期。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又对李德裕打击报复。首先他让李党李咸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李绅虽然早就死了，牛党也不放过他，追回他的所有官衔。中书舍人崔嘏贬端州刺史。此外被贬的李党或李党的支持者，还有李回、石雄、郑亚、丁柔立等。

反过来，牛党的白敏中执政以来，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改善其待遇，或复其官职。会昌六年八月，首先提拔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第二年，调牛僧孺回东都，任太子少师。其次，撤销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准备以后再提拔，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珣为户部尚书。这样看来，从大中年间白敏中执政以后，李党及其支持者都被逐出首都，或贬到边州，或遭流放，几乎无一幸免。而牛党人员不仅得到升迁，而且当了中央高级官员，朝廷上下又成了牛党的天下。

牛党这次重新上台以后，不仅狠狠打击李党成员，连李党以前执行的政政策也全部改变了。最明显的是恢复了佛教发展的自由。很快，全国各地又纷

纷建起了许多新的庙宇，许多人又都出家去当尼姑、和尚。不久，牛党又增加地方官的数量。光州县官就增加了 383 名。

两个集团纷争角逐，都勾结宦官做后台。如牛党中的首要分子李逢吉，在长庆二年（822 年）任相，是暗中交结皇帝亲信宦官的结果；李党党魁李德裕在开成五年（840 年）任相，也是依靠宦官杨钦若的关系，由宦官仇士良提拔的。他们都是在宦官操纵下，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势。这就不可能打击最腐朽最反动的宦官集团。反而与宦官同流合污，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与分裂，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强大统一的唐王朝趋于削弱瓦解。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年）是李党的全盛时期。据说李德裕在扬州时，监军宦官杨钦义被召进京。李请他到内堂宴饮，不请陪客，席旁陈列各种各样精巧绝伦的宝器图书，宴罢，全数奉赠，钦义大喜。这明明是希望他还朝之后汲引自己。杨钦义走到半路，奉命回任，到了扬州，把礼物退还。李坚决不收，钦义更觉见情。后来他做了枢密使，便设法使李德裕做了宰相。李德裕掌了权，把牛僧孺、李宗闵都贬逐到南方。

会昌六年（846 年），武宗病死。宦官马元贽等自作主张立宣宗（李忱，宪宗子，武宗叔）。内廷宦官的势力有了变动，外廷也跟着发生变化。李党很快失势，牛党的官员纷纷起用。

牛僧孺在党争方面比李德裕的手段更无情，为了打击李德裕，他甚至拿国家利益当儿戏。上文提到的李德裕接受吐蕃将领投降一事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牛僧孺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硬是命令李德裕将已经收复的土地交还给吐蕃。这是极端荒谬的卖国行为。

一般来说，尽管在牛李党争的 40 年间国家仍有发展，但出现的问题同样非常多，这些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成了唐末大动荡的隐患。这不能不归因于牛党和李党之间无原则的争斗。

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倾轧争夺，加深了朝政的混乱，助长了宦官的专横，没有多少的积极意义。唐宣宗时，牛李党争已近尾声，然而外廷的官僚与内廷的宦官互争权势，却又闹得厉害起来。这个情形一直继续到了唐末。

在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党争剧烈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更为混乱与昏暗。腐朽、黑暗政治的发展，形成了机构庞杂，贿赂公行的政风。政府机构日益臃肿，冗员日增月溢。据元和年间（806—820 年）统计，唐政府文武官吏及各种胥吏达到 388668 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144 万计算，平均每 7 户就得供奉两个官员。所以出现了国家财政日益少，而官员俸禄却日益增多的现象。随着官员的增多，官场的舞弊徇私也很惊人。太和中（827—835 年），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称：官僚刘 é、刘洵和胡自中等，伪造自己的科举出身材料，并卖官职给有钱的人。太和二年（828 年），另一个案件更是严重，南曹县令李某伙同 6 个人，伪造出身材料，出卖官职，一下子卖掉了 65 个官职，收取卖官的钱共 16730 贯。

中央与地方官员的种种恶劣行为，已经形成了风气。加上牛李两党长期斗争造成的政治混乱局面，唐朝的统治秩序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

唐朝末年，皇室日益不振，一切军政大权都被朝中大臣所掌握，王纲衰败，天下纷乱。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五代十国，首先是公元907年唐节度使朱温夺取了唐朝政权，建立后梁。然而，朝中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也不甘心，纷纷争夺皇位，从此半个多世纪，战祸不断，生灵涂炭，人民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都渴望和平的到来。公元960年1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奉命征讨北汉刘钧及辽兵，适逢周世宗驾崩不久，新皇上幼弱，将士们一起商议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被众将士们以黄袍加身，在陈桥发动了兵变，历史上称为“陈桥兵变”。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北宋王朝。

赵匡胤篡取后周政权，有它的主客观原因。

唐朝末年黄巢揭起了起义的大旗，攻占了唐都长安，却被晋王李克用击败，然而李克用也没能挽救唐朝衰败的命运，又被朱温打败，从此中华大地上在频繁的政权交替中度过了几十年，梁、唐、晋、汉、周，前仆后继，此争彼夺，各争一时一地，但没有一个皇帝能够统一中原，都是刚一立国，便起亡国之祸。最长久的也只有10余年，短促的不过两三年便灭亡了。长期的战争，人民生活极为贫困，不仅人民渴望得到安宁的生活，就连后唐明宗也为自己无法平治这种妻离子散的社会现状而向上天祈祷，请求上天生下圣人来，拯救百姓。

传说唐明宗下面有个从军都指挥使赵弘殷，他府中生下一个奇异的孩儿。孩儿诞生的时候，红光满屋，多日不散，屋脊上紫气围绕，孩子遍体呈现金色，还有异香，被称作香孩儿。此时赵弘殷正要随天雄节度使石敬瑭赴阆州，征剿阆州节度使董璋，忽然在出征前夕得此佳儿，狂喜之余，给香孩儿取名叫赵匡胤。

赵匡胤自幼就与众不同，他在与伙伴玩耍嬉戏中，便喜欢排兵布阵，自己做大元帅，指挥伙伴作些行军打仗的游戏。等到年纪稍微大了些，他便出入于军营之中，学习舞刀、击剑、射箭、骑马的技术。逐渐地养成了豪爽的性格，结交了石守信、张光翰、赵彦徽等一群勇武的少年朋友。他的豪放之名不久便远近闻名了，诸如磁州的韩令神、太原的慕容延钊等人都慕名不约而同地赶到洛阳来和赵匡胤结拜。于是，这伙少年朋友便终日在一起较量武艺，谈论兵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匡胤的志向越来越远大。他时常想仿唐太宗李世民的作为：用一匹马、一杆枪去荡平天下，去干一番大事业。这时已是后汉乾佑年间了。赵弘殷奉命出征凤翔，战胜了王景，积功升官成了都指挥使。赵匡胤便决定西去追随在外统兵作帅的父亲去博取战功、建立功业。于是，他便辞别了妻子、母亲，连夜离家而去。

赵匡胤先是一路南行，后又转而北上，这日他渡过汉水，顺流而上，恰巧来到了后汉枢密副使郭威的大营。当时汉隐帝刚刚登基，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推李守贞作盟主起兵叛乱。郭威受命领兵西征。当郭威得知赵匡胤为将门之后，为了招慰，安抚叛乱，便问他：“你为何不在家中享福，反来此投军，往辛苦路上走呢？”赵匡胤答道：“凡人不可以专门靠祖宗基业，倚赖父母的福荫，而自己游手好闲，白过一生。而应趁青春年少，舍弃安逸，多吃辛苦，做出一番大事业，才称得起是大丈夫！况且现在，正当乱世，应

乘好时机建功立业，否则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郭威心下十分爱悦，又命赵匡胤试着表演武艺，更是样样精通，真可谓武艺高强，艺压群芳，郭威十分满意，认为他绝非凡夫俗子能比，日后定能相助自己，于是便把赵匡胤留在了帐下。

赵匡胤随郭威赴河中征剿，屡建战功。后来李守贞败死，河中平定，郭威到邺都留守，对赵匡胤更加信任。此时后汉隐帝在位，觉得周围将相的权力过大，就找机会杀掉了一些大官，如总机政的杨赟、典宿卫的史弘肇、掌财赋的王章，并且派人去邺都杀害郭威，这便激起郭威叛变。公元950年，郭威起兵南下，攻入开封，推翻了后汉政权，建立了后周王朝，于是郭威提拔赵匡胤做了东西班行首，滑州副指挥，不久，又升为开封府马直军使。可郭威不久即病故，他的义子柴荣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因周世宗与赵匡胤最为交好，便升他进典禁军。

周世宗刚刚即位，北汉主刘崇便率兵3万，又联合辽兵万余人直杀洛阳。边关频频告急，周世宗便亲率大军前去迎击。不一日到了泽州，安营下寨，北汉的部队在高平之南屯扎。世宗使命令前锋部队出击，北汉兵退10里，周世宗怕敌人逃掉，便催促部队疾速前进。周军将士见援军没到，又看见汉兵人人勇猛强壮，早有了畏惧之心，因此两军刚一交战，周军阵内便窜出一支军马，立时投降，丢盔卸甲，北向呼万岁，声震山谷。步兵一见，也有千余人跟了过去，愿同作降虏。其余三军将士虽不肯同流，也斗志顿减。周世宗见兵势危急，送亲自领兵冒险阵前与汉兵搏战。北汉主刘崇看见周世宗亲自冲杀，便命弓箭齐向世宗射来。当时赵匡胤也在军中，便大喊道：“主忧臣辱，主危臣死，现在主上危急，我等还不努力向前，更待何时呢？”

于是，和禁兵将领张永得各率精兵2000人，分左右两翼向汉阵包抄冲杀。赵匡胤持枪跃马，身先士卒直捣敌阵，周军将士勇气大增，个个奋勇，正可谓一鼓作气。由于周军将士个个以一当百，汉军大败，北汉主刘崇逃入晋阳城，闭城自守，丢弃的兵器、粮草不计其数，周世宗得胜领兵还都，提升赵匡胤为虞侯，做严州刺史。

这次高平战役之后，周世宗柴荣着手整编禁卫军，责成赵匡胤具体整编，赵匡胤秉承柴荣的意旨，精选一批武艺超群的壮士，编成殿前诸班，经过补充人员，加强训练，这支禁军便成了后来战斗力最强的队伍。公元955年，周世宗攻打南唐刘仁贍。当时刘仁贍坚守寿州，后周诸军急切未能攻陷，而在淮河下游的涂山等地又驻有水陆两路唐军万余人，威胁着后周的围城队伍。为解除这个威胁，柴荣将任务交给赵匡胤，命他攻击下游唐军。赵匡胤首先派遣百余骑兵直奔敌营，把对方诱进预先布置好的阵地，一声暗号，伏兵齐发，大败唐军，杀死唐将何延锡，夺得战船50只，周军大获全胜。

滁州是唐都金陵的天然屏障，是周军必争的军事重地。为早日夺取淮南，柴荣命赵匡胤分兵攻打滁州。赵匡胤率领几千军兵兼程前进，却在清流关下被南唐将皇甫晖战败，为了反败为胜，赵亲自去拜访当地名士赵学究（当时是教书先生，后成为赵的谋士），终得奇计。周军连夜出发，由小路绕到清流山背后，趁着西涧水大涨的好时机，浮水而下，从唐军后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活捉了皇甫晖和姚凤，占领了滁州城，随后周军乘胜又攻下了扬州、泰州，一时“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通过这一战，赵匡胤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显露，个人威信也大大提高了。

不久南唐陆孟俊反攻泰州，周守军不战而逃，陆孟俊乘胜进攻扬州，周

将韩令坤又欲弃扬州而逃。柴荣一面派张永德支援，一面派赵匡胤率兵 2000 人驻屯六合。赵一到目的地便下令：“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斩其足！”这使得韩令坤也决心坚守，终于杀败了南唐军，俘获了陆孟俊。这时，南唐齐王李景这又率兵 2 万人向六合逼来。部将们请求赵匡胤迅速出兵进攻，赵匡胤说：“他们设立障碍自守阵地，表明害怕我们，我军不满 2000 人，如果出击，就暴露了自己兵少，不如听候他们前来，必定可以将他们打败！”没几天，南唐军果然主动进攻六合，被赵匡胤杀得大败。战斗中，赵匡胤亲自督战，见有士兵不肯拚战，就在他的皮笠上砍下一个标记，第二天检阅队伍，几十个皮笠上有剑痕的士兵，立刻被斩了头。经过这样的整顿军纪，士兵的战斗力大为加强了。

赵匡胤因屡建战功被任命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经过滁州这一战役，赵匡胤终于官高位显了，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这为他以后发动陈桥兵变，直到黄袍加身，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公元 957 年，赵匡胤再次随柴荣南征。在寿州城下，赵匡胤率军一连攻破紫金山上几处营寨，切断唐军所筑甬道，使唐军首尾不能相救，为完全孤立寿州城，乃至最终迫使寿州的唐军投降，立下了汗马功劳。返京后，赵匡胤因屡立战功，改领义成军节度使。不久，赵匡胤又因攻占楚州、扬州、泰州等城池，以及大破南唐水军等战功，改担任颂忠武军节度使。

后周占领了南唐等地之后，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于是周世宗柴荣便想掉转头来对付契丹，以除北方外族的威胁。公元 959 年，周世宗柴荣亲征契丹，在这次北伐的前线，柴荣无意中捡到了一块木牌，有二三尺长，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几个大字，柴荣虽然明知道这又是野心家造谣惑众的伎俩，但心中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猜忌。当时张永德官居殿前都点检，掌握着当时全国最为精锐的部队——禁军，同时张永德又是后周建国皇帝、柴荣义父郭威的佳婿。柴荣目睹了多次因将帅兵权过重而篡位的史实，害怕这张永德的权势过重而跋扈难制，便解除了张永德的军职，升赵匡胤做了殿前都点检。柴荣为使柴氏子孙长久地享有统治权而作出的这一决定，使得赵匡胤的势力更加雄厚。

周世宗柴荣这次北征，先后收降了宁州、益津关、瓦桥关等处的守将，边境城邑，望风归附，光复了关南的全部国土。正当柴荣准备继续向北追杀，攻取幽州的时候，他却突然得病倒下，向北讨伐的计划只得停止。柴荣率领部队返回京师，病情日渐加重，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皇长子柴宗训当时只有 7 岁便接替了王位。柴荣企图踏平周围国家以统一中原的远大志向，及在用兵时的雄韬伟略，使赵匡胤有了用武之地，并使他在连年争战的乱世中拥有了自己的一份雄厚的军事力量。同时，柴荣的早逝及幼主的继位，又为赵匡胤寻求更大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

年幼的周主柴宗训，负担不起任何治理国家的实际责任，国家大事只好交给几位辅政大臣来处理。大臣之中宰相范质是个循规蹈矩的“忠厚长者”，性情直率，廉洁自好，但天性软弱，决不是乱世中的中流砥柱。侍卫亲军副指挥使韩通，出身于行武之家，性格过于暴躁，有勇无谋，他的部下对他并不信服。只有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历典禁兵，战功累累，对部下又能够“恩威并施”，因此使将士们心服口服，威信极高。

赵匡胤名望、地位一天天高起来，这使他自己原来想模仿唐太宗李世民去荡平天下的志向，重又萌动起来。同时，也使一些大臣对他掌有过大的权

力有了几分担心和不满。早在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候，大臣郑起就上书宰相范质，大谈赵匡胤如何如何得下面士兵的拥护，这样下去会对周家的天下造成很大威胁。还有个官杨徽之还劝告柴荣，应该解除赵匡胤的禁军军职。柴宗训继位以后，虽韩通和赵匡胤两名大将同时掌管侍卫军，可军事大权主要归韩通掌管，当时韩通的儿子韩徽劝他父亲铲除赵匡胤以除后患，而韩通并没听从，觉得赵匡胤在军中威信高，这样一来反而会失去军心。于是，这就促使赵匡胤集团日渐形成并最后采取了行动。

当时赵匡胤团结了一班“知兵法，善用兵法”的武将，也就是和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斌、王政忠等结成义社的十兄弟。同时，他还有一支强大的劲旅作为后盾，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一班不甘寂寞的人物的支持，于是，一个巨大阴谋渐渐形成并且付诸实施了。

公元 960 年，赵匡胤集团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向朝廷谎报军情，说是契丹和北汉联合起来入侵周朝。当朝廷接到了这来自镇州、定州的“探报”后，宰相范质、王溥等便紧急召集人员商议，决定派遣赵匡胤统率宿卫诸将士北征。其实，所谓契丹入侵的谎报，仅仅是赵匡胤集团所采取的阴谋行动的第一个步骤。因为假借外族人入侵的威胁，赵匡胤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举足轻重”的姿态，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同时，还因为周朝统治集团在开封有着牢固的势力，利用出征北伐，可以摆脱后周势力的束缚。更主要的是，可以选择一个有利的地点来集结自己的力量。另外抵御契丹侵略，赵匡胤便是以“民族保卫者”的身份出现，可以获得广泛的人民支持，这也正是当年郭威被拥立时的故技重演。

然而，事情也不那么顺利，京城里人多嘴杂耳目又多，赵匡胤行动的秘密有所泄露。大军临出发前，京城里策立新天子的流言传遍了各个角落，只有当时最高当局的朝廷还被蒙在鼓里。韩通的儿子韩徽得知此信向父亲献计，要趁赵匡胤入朝辞行的机会，乘机将他杀掉，但韩通却极力阻止，使赵匡胤能够顺利地率领部队离都出发了。一场影响中国数百年历史的行动，拉开了它的序幕。

在开封东北 20 公里的陈桥驿四周，环列着成千上万的营帐，西斜的日光照射在战旗上，放出异彩。众士兵各归各的队伍，分守营寨，纪律十分森严。这里也驻扎着赵匡胤所率领的北征队伍。

在大军刚到陈桥的时候，前军散骑指挥苗训就仰观天象，声称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正在沉没，而另一个却正在升起。苗训并向站在自己旁边的楚昭辅解释说，那个正在沉没的太阳是当今幼帝，而那个正在上升的太阳便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是，这话就一传十、十传百，没多久，全军的将士都知道了这一上天传下来的赵匡胤当做天子的讯息。

果然没过多久，江宁节度使高怀德就聚集了很多将士密谋说：“当今皇上年纪幼小，不很明事理，又没有贤臣在他左右辅助，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地去攻打敌人，驰骋沙场，就是立下汗马功劳，又有谁承认给予奖赏呢？我看还不如顺应天意、人意，先拥立我们的都点检做了天子，然后再去北征，各位将军认为这主意怎么样？”当时在场的各位将士早有同样的心思，听高怀德这一倡议，谁还会说不同意呢？大家齐声说：“就该这样，咱们一起商量个办法吧！”都押衙李处耘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还得同都点检的胞弟供奉官都知赵匡义商量一下才更好”。高怀德说：“对，对，对，应当

和他商量。”于是，大家就把赵匡胤请来。赵匡胤说道：“我哥哥赵匡胤向来以忠义闻名军内外，如果我们冒昧进言，他肯定不会答应，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才不会遭到拒绝。”此时正好掌书记赵普到来，于是赵匡胤又把众将的谋划告诉了赵普。赵普说道：“我也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现在下边各军营的兵士，都聚集在营门前，纷纷议论：都点检倘若不肯登基，那我们冲锋陷阵去厮杀，又是为了谁呢？哪还不如各自散去，回家种地过日子好呢？兵士如此说，民心就可以看出来，只要我们一到汴京，大事便可成功。我们趁着今夜，这样，这样……准备起来。到时候，点检即使不同意，也没有办法了。”众将官听了赵普的话，齐声说好，便与赵匡胤、赵普一同出来，整顿队伍，齐集了各营的将士，向大家宣布了所定的计划。一时军中欢声雷动，谁都愿意都点检早日做天子，大家好重新过上和平的生活。众将官准备完毕，一直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便一起来到赵匡胤的营帐门前，齐呼万岁。守门的侍卒连忙摇手禁止道：“都点检还未起床，大家不要惊扰。”众人一齐说道：“今天册立都点检为天子，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推举赵匡胤出来，进入赵匡胤的营房，请都点检起身受贺。此时赵匡胤便推开众人直接进入赵匡胤的军帐，正好赵匡胤刚刚醒来，赵匡胤便把诸将的意思以及军士们归心的情形向他细细讲述一遍。赵匡胤说：“这样的事，怎么可以做呢？诸将贪图富贵，倒还可以理解，你是我的弟弟，怎么可以这样地让我陷于不忠、不义之地呢？”赵匡胤说：“古代早有明训，‘老天爷给予你的好处，你不要，会反倒受害的’。现在军士们如此心归于你，都说都点检如果不做天子，我们就解散回家种地去了，如果兵士果真都散去了，没人守卫边关，哥哥你不是也同样有罪吗？请哥哥不要再有顾虑了。”赵匡胤还是有些犹豫不定，说：我出去再和众将官谈谈，再作打算。”说着赵匡胤走出营帐，只见众将官都聚在那里，军士们手拿兵刃围绕在四周，一齐高呼：三军无主，愿奉都点检为天子。赵匡胤还没来得及说话，高怀德和石守信已手捧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全军的将士一齐下拜，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内外。赵匡胤说道：“你们想要富贵，却使我背负了这不义的名声，况且此事重大，怎么可以仓促行事呢？”赵普道：“天命所向，人心归顺，明公如果再推让，反而上违天意，下失人心了。”赵匡胤说：“我受世宗大恩，现今世宗尸骨未寒，我就背叛他，天下人会怎样说我呢？”赵普道：“想要报世宗的恩，只要善待幼主和皇太后，使他们安享快乐，也就可以了。”匡胤还要说话，却已被请将拥上了马，不由分说，向汴京进发。赵匡胤拉住僵绳对诸将说：“我有号令，你们若能遵从，我就回汴京，否则宁死也不回去。”诸将官齐声答道：“听令！”赵匡胤下令道：“太后和主上，我本应当忠心侍奉，你们不许冒犯。京内的大臣，过去都是我的同事，你们不许欺凌。朝廷的银库及平民人家，你们不许侵扰。听从我的话的，以后重赏，不听话，有违反纪律的，满门抄斩，决不宽容。”此时众将官再次表示了听从命令。赵匡胤这才整理队伍向汴京进发了。

此时京城里已经得到了消息，正赶上早朝的时候，满朝文武官员突然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得相顾失色，不知所措。符太后对范质说道：“你们保举赵匡胤领兵退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呢？”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范质悄声地说道：“让我去劝说赵匡胤，用大义来劝导他，让他遵守做臣子的规矩。”符太后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含泪回到后宫。范质退朝出去，紧握右仆射王溥的手说：“仓猝之间派将领出征，才酿成了这样的事变，现

在可怎么办呢？”由于心里着急，用力过猛，竟把指甲掐入了王溥的肉里。这时候侍卫亲军副都指挥韩通从禁中跑出来，范质连忙问他有什么办法。韩通说道：“现在也没办法了，只有我去召集禁军，登楼守御：两位去请旨，向各蕃镇发出檄文，命令他们火速来保驾，你我赶快分头去做吧。迟了便来不及了。”说完，韩通骑马回头而去。

由于在禁城中有内应，赵匡胤的部队此时已经进入到禁城之中。韩通一看来不及招集禁军进行抵御，便从小道飞马向家中跑去。赵匡胤前军都校王彦升骑马在后急追。韩通跑入家门，正想关门，不料王彦升随后赶到，手起刀落，把韩通劈死在门内。随后王彦升杀死了韩通全家，然后才返身出来迎接赵匡胤。

赵匡胤领着大军，缓缓地从明德门鱼贯入城，命令将士一律归营，自己则退居到公署之中。不一会儿，军校罗彦攘推拥着范质、王溥等人到来。赵匡胤流着泪向众人说：“我受世宗的大恩，却被大军逼迫着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没有脸再去面对天地了。”范质等人正要答话，罗彦攘拔剑厉声说道：“我们没有主公，今天已经推立都点检做天子了！有不从命的，就请先来试试我这把宝剑吧！”王溥害怕极了，首先跪倒在地，范质没有办法，见势头不好，也跟着跪倒在地。赵匡胤连忙走下台阶扶起两人，于是范质便诚惶诚恐地拜请赵匡胤到崇元殿去行禅代礼，赵匡胤就命令范质等人先走入朝，召集百官做好准备，范质等人领了令走了。

百官齐集，按班排定以后，石守信、王审琦等左右拥护着赵匡胤从容受禅，就算领了上天佛祖的认可。翰林承旨陶谷取出禅诏，由兵部侍郎窦仪宣读。读诏完毕，宣徽使引领赵匡胤到北面拜受诏书，然后掖引赵匡胤登崇元殿、即皇帝位。经过陈桥兵变，赵匡胤终于心想事成，了却了自己的心愿，成了宋朝开基的太祖皇帝。

赵匡胤虽然如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地方上的异己势力还是很强大，许多藩镇不肯臣服，一些周朝拥有重兵的老将或采取观望的态度，或直接起来抗命，在统一中原的道路上依旧是困难重重。

此时赵匡胤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课题便是如何巩固政权。在当时的形势下，对那些态度不明朗、脚踏两只船的政敌，实行监视和收买，为使政权迅速稳定，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至于那些公开起来反抗的，那就不得不用暴力杀死，清除他们。

首先直接起来反抗的强蕃是在潞州镇守8年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李筠原是后周的开国功臣，平日在蕃镇，他专门截留中央的税金，招集纠结一些亡命之徒，早有自己做王之心。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候，念他是养父郭威的旧臣，只好让他几分。如今却要他对出身低微的赵匡胤屈身称臣，那是绝对无办法做到的。终于在公元960年4月，李筠在潞州公开树起了反宋的旗帜。

赵匡胤首先命石守信、高怀德做前军，慕容延剑、王全斌率众由东路策应去征讨李筠。5月，两军在长平首次交锋，宋军大胜，杀死敌兵3000多人。这时赵匡胤的亲征军又从汴梁出发，过荥阳，渡黄河，穿太行，在同年6月进入泽州城下。在经过太行山的时候，由于山路险峻多石，大军无法通行，赵匡胤率先下马亲自搬运了几块大石，群臣和将士一看皇帝身先士卒，立时跟着执行清除石块命令，将那嶙峋险恶的山径，立刻筑成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这时，石守信的军马已在泽州南面击破李筠的主力，进逼泽州，李筠被

迫退入泽州城，据城固守。

正当赵匡胤率军征讨李筠的时候，又一名后周宿将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起了反宋之心。于是李重进派亲吏翟守恂赶往潞州面见李筠，商议缔结同盟共同反宋。不想，这翟守恂原本和赵匡胤交情很好，竟偷偷跑到汴梁，将此事禀告了赵匡胤。于是，赵匡胤重赏了翟守恂，并派他返回扬州，设法延缓李重进的反抗行动，阻止西北两大势力的夹击。由于这一阴谋的得逞，使宋朝军队避免了在西北两线同时作战，使得赵匡胤从容集中力量，打垮了李筠的进攻，继而挥师南下，又粉碎了李重进的反抗。

征讨李筠、李重进这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后周的残余势力基本被铲除，赵宋政权得到了巩固，同时也使赵匡胤对自己的军队充满了信心，于是，他便决心去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宋太祖赵匡胤刚刚登位的时候，曾经多次微服私访。这一天，天下着大雪，赵普退朝回家，天已经很晚了，突然听到敲门声，赵普走出来，却见太祖站在风雪之中，赵普忙迎拜，太祖说道：“已经约了晋王了（即赵匡义，他因避免与太祖名字相似，已改名为赵光义。）”不久，赵光义便来了。于是在赵家的厅堂中他们席地而坐，吃酒、吃肉。赵普问：“天已经这样晚了，又这么冷，陛下为什么还出来呢？”太祖说，“我一直睡不踏实，我国的疆土这么狭小，而四周又环列着那么多的强敌，因此才到你这里来。”赵普回答说：“陛下认为自己的国家太小了吗？那么南征北战，现在正是时候。我愿听听陛下想先向那个方向进攻呢？”赵匡胤说：“我想先攻打太原。”赵普沉默了很久才说：“太原正好阻挡着西边西夏和辽这两个国家，即使我们一举攻下了太原，那么西边和北边这两方面的忧患便由我们独立承当了，为什么我们不先留下它，等到平定了其他各国，那么太原这弹丸之地也就无处可逃了。”太祖笑道：“这正是我的意思，我只是试试你罢了。”于是便定了先攻江南后打北方统一中原的谋划。

尽管宋太祖赵匡胤此时的军事力量已十分雄厚，统一中原的大政方针，即“先南后北”的谋划已确定，但还有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困扰着他，那就是高级将领的军权过重。

一次在会见赵普的时候，太祖问道：“自从唐亡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8个姓氏，战斗不止，人民生活痛苦，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让天下无战争，为国家作长久之计，应该怎么办呢？”赵普回答：“没有别的，只因为地方权势过大，君王弱，而臣子强罢了。要变也不难，削减他们的供给，限制他们的权力，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安定了。”对于赵普的话，赵匡胤本身的经历就说明这点，他就是兵权过大而在陈桥兵变篡位的，所以，他很怕别人也会对他这样办。可是，赵匡胤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等人，有的是好友，有的是结义兄弟，削弱他们势力，赵匡胤还有些犹豫不决。当赵匡胤陷入权力和友谊的矛盾时，赵普便说服他道：“我看他们都没有很强的统率部队的权力，对制伏部下还能力弱，万一部下作乱，他们也管不了，不如您把兵权统一掌管起来。”赵匡胤就这样下定了决心，把兵权、政权统一拿在自己手中。

公元961年春天，趁慕容延钊和韩令坤返京之机，赵匡胤就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分别派他们出任山南西道和成德节度使。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预备了丰盛酒席，约石守信几个将领一起吃饭，席间，赵退去左右对石守信说：“由于你们出力，我才有今天，我很感谢你们。不过，做天子真不

容易，还不如做小官快乐，我没有一夜睡得安稳。”石守信忙问什么原因，赵说，这不难知道：“我这君王位置谁不想做？”石守信等明白这是赵王怀疑他们，忙跪下叩头道：“今天下已安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说：“我相信你们没二心，但你们部下如有人贪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怕你们也没办法呀！”众将听到此更加害怕，连忙叩头说：“这些我们没想到，请主上指条生路。”赵说：“人生就是为富贵，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出守边疆，多买些田产，为子孙置下不动产，快乐过一辈子，我还与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好？”第二天这些将领纷纷提请免军职，赵很好地安慰他们，送给他们很多财物，于是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都以节度使名义各奔东西，远离京城去镇守边关了。只有石守信留下，也无实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了。

通过种种努力，赵摆脱了朝廷内外的威胁，于是宋太祖赵匡胤放心地按自己所想，去征战南北，在赵光义的继续协助下，终于完成了他统一中原的大业。

鉴真东渡

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有一位僧人曾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鉴真。

鉴真，生于公元688年（垂拱4年），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姓淳于。长安元年（701年）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当了和尚。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游学洛阳、长安。第二年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具足戒，后来又回到扬州。他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为一代律宗大师。

那么，鉴真又为什么要到东瀛日本去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呢？他到日本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下面我们将为读者朋友们逐一解答这些疑问。

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不仅如此，唐朝的文化，灿烂辉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当中，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比较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十分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70多个。唐政府专门设置了鸿胪寺这个机构来接待络绎不绝的各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又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司来掌管对外贸易。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在政府机构中也有外国人担任官职。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尤以首都长安最为著名。

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长安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与扩大，唐朝的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天的蒙古地区可到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往西可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的广大中亚地区。西路经过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新疆内有三条路可通向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以达到尼泊尔和印度；或者经过南诏、缅甸到达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条路线。一条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一条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出发，从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一条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可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以及印度。

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波斯湾沿岸地区。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达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国际大都市。

日本当时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由于受到当时隋唐先进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

化改新”。改新以前，日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和近似奴隶的部民，而部民尤占大多数。他们和土地都为氏族贵族所私有。贵族对部民恣意驱使剥削，没有沦为部民的农民同样受到沉重的榨取和奴役。贵族一方面和皇室争夺权势，强占土地和部民，一方面彼此之间也进行斗争。发掘出的3至7世纪的古坟，相当多属于拥有部民的贵族。坟中殉葬品有大刀、勾玉、镜、甲冑、陶器等，主要是汉时部民所生产。这些东西反映当时生产力水平不算太高。4世纪末叶以来，不断有所谓“归化人”也就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定居日本。他们不仅带来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文字。通晓汉文的移民组成所谓“文部”，他们替皇室掌管文书。雄略天皇给刘宋皇帝的信，是用很优美的汉文写的，可能就是出于中国移民之手。可是从4世纪末到7世纪初200年间，虽有大批的、各方面的移民来到日本，日本却始终没有出现经济文化发达的高潮。隋朝建立后，日本从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开始派遣隋使来中国，前后共遣使4次，并且同时也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隋朝也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但到大化改新前夕这45年中，也还没有出现奈良时期那样灿烂的文化。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当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使它得不到发展。大陆的移民到日本后，也都被编为部民。他们的技术文化虽然影响了日本，使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然而，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移民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文化经济交流所能产生的影响因而也受到很大限制。

6、7世纪，东亚大陆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大和国的统治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大帝国的相继出现以及新罗与唐朝的联合，不只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还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此以前，日本统治阶级一贯把从朝鲜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奴隶），作为国内统治的有力支柱。朝鲜的强盛，使日本掠夺朝鲜的图谋彻底失败。这不仅使大和朝廷和贵族失去从大陆获取先进技术和劳动力的条件，从而造成经济上的困难，而且政治威信也大为降低。

这种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结合，造成大和国统治的危机。面对这种现实，日本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感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

推古天皇（女帝）时期（592—628年），以圣德太子为摄政（593—622年）。圣德太子致力于提高王权，提倡佛教。对外致力于与中国的平等友好外交，并向隋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圣德太子时期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直接学习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为大化改新作思想准备。公元632年，从中国留学回国的学问僧等，曾向推古天皇上奏，说唐朝是“法式备定”的国家，应建立经常的来往，并建议把已经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召回，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南渊清安等人，回日时带回了大量的唐的文化典籍，并把它运用于日本，对大化改新发生了积极作用。南渊清安在唐留学后著书立说，阐述唐朝的律令制度。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先生，高向和僧旻则直接参与了改新活动。学习中国，日本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大化改新以后的情况便截然不同了。改新前夕，部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反对中央和地方的豪族。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

顺应时代的趋势，645 年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打倒豪族首领苏我氏，废除了部民制，把土地和人民都变为国家的公地和公民。新政府实行了班田制，这实际是一种封建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代表旧势力的贵族们顽强反抗，经过 20 年，到 664 年曾一度恢复部民制，674 年才完全废止。701 年（大宝元年）修成“大宝律令”，改新以来的变革到这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这样，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改新才最后完成，日本过渡到封建社会。大化改新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可是，原为豪族私有的部民改变了身分，过去漫无止境的剥削暂时为固定的租税和徭役所代替。农民私有宅地和园地，能使用山林池沼，生产兴趣有所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由于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生产力相适应，到奈良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发达的局面。

由于日本社会生产关系改变，封建制度开始建立并向上发展，唐代中国的一切，从生产工具技术直到典章制度，都对于奈良时期的日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也易于接受和融为己有。日本史书上不断提到唐耒、唐锹、唐箕、唐竿、唐臼、唐碓等，正仓院还保存有孝谦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 年）躬耕籍田时所用的唐耒。762 年，淳仁天皇命东海、南海、西海等道，仿“唐国新样”缝制兵士的棉袄和胄各 20250 具。班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律令等，无不取法唐朝。这一时期唐的绘画、书法、文学、宗教等也都介绍进来。720 年，元正天皇下诏，僧人传经唱礼都应遵照中国僧人道荣和入唐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730 年，圣武天皇命令选拔青年学习汉语。以前，入唐留学的吉备真等人，在介绍中国制度与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奈良时期中日文化频繁交流，这对于光辉灿烂的奈良文化之形成，中国影响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后汉以来 700 年间中日经济文化关系的历史，到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建立了新生产关系的日本封建社会迫切需要吸收唐代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圣德太子曾经梦想提高王权，巩固中央统治，这个任务经过大化改新而实现。奈良时期日本封建统治者要求进一步巩固中央权力，因此，更热心于吸取唐朝的制度。他们的眼界比过去的统治者扩大了。他们的奢侈欲望加深了。为满足这些欲求，他们也急于输入中国文化艺术以及书籍、工艺品等等。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不相同，因此有些采自中国的作法并未能生效，比如“平城京”的西市始终未曾繁荣，货币也未在奈良时期广泛流通。可是总的讲来，奈良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加上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促成了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

鉴真大和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外历史条件之下到达日本的。

奈良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日本派遣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都随遣唐使往返，中国人也随遣唐使船东渡日本。

从 630 年到 838 年，除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者外，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共有 13 次之多，平均约 15 年有一次。奈良时期共派遣 4 次，即 717 年（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33 年（圣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唐开元廿一年），752 年（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777 年（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奈良时期遣唐使团规模宏大，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除此之外，有各方面人员：知乘船事、造船都匠、船匠、舵师、水夫长、水手等，是负责划船、修理和管理船只的；画师、玉生、铸生、细工生、和音声生是为使团工作同时也入唐学习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留学生和学问僧

是专门为入唐请益的；医师和射手是为保护健康和警卫的；译语、史生等是为通译记录等工作的；还有主神、阴阳师、卜部等是为祈祷安全的。一般每次共五六百人，分乘4只船，因而“四只船”在当时文学作品中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语。这样庞大的使团所需费用浩繁，足见日本统治阶级对于遣使的重视。除双方政府互相馈赠之外，上自大使，下到待从，一般都在中国进行一些贸易，每次几乎都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入唐请益，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作用。

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遣唐使来中国，邀请中国高僧到日本传戒。因鉴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律宗大师，他们于是在天宝元年（742年）到广陵郡（扬州），请鉴真东渡。鉴真当时正在大明寺讲律，认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便问僧人们：“你们谁能够接受这一来自远方的邀请，而到日本国去传授律法？”当时全场鸦雀无声，无人答应。过了许久，祥彦回答说：“大家不愿去的原因是，那个国家距离我大唐太遥远了，此一去须横渡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生死攸关，性命难存，就是去100个人也没有1个人能够平安到达的。”鉴真则毅然而起，说：“为了传法，还怎么再去爱惜区区小命！你们各位不去，我就必须去！”说话掷地有声。僧人们看见鉴真如此坚决，自觉汗颜，于是有祥彦等21人表示愿意追随师父东渡，而这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55岁了。

荣叡、普照不及等待10年以后才来的下一次遣唐使，请求宰相李林甫的兄弟李林宗给广陵郡司仓参军事李湊写信，替他们造大船并备办干粮，准备渡海。计划随鉴真东渡的僧人中，道航和如海发生争论。道航认为如海学问不高不能去，如海大怒，于是告淮南采访使，说道航造船入海，欲与海贼相连。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的报告颇为惊骇，经过调查后证明如海诬告。可是采访使最后决定：“今海贼大动，不须过海去！”而且没收所造的船，归还其他物资，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未能成功。

到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再次和荣叡等商量，用80贯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雇妥18名水手，购买了经籍、佛具、药品和干粮等，准备渡海。刘巨鳞这时已奉命到永嘉、临海、余姚一带攻打吴令光，“军舟”当即用于镇压吴令光的军事行动。否则鉴真在广陵而远到南海购买船只，是不可想象的事了。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八年（749年）：“五月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卷九八《卢奂传》：“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乃特授奂为南海太守。”因此，刘巨鳞盗卖官物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刘巨鳞不但贪求现世利禄，而且梦想“来生”的享受，非常信奉佛教。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载不空开元末年来师子国，经过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辩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从刘巨鳞对待不空的态度推测，卖军船支持鉴真渡海传戒，这也是很自然的了。

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率领荣叡、普照、祥彦、思托等17个僧人，以及和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共85人，乘军舟东下。他们在余姚郡狼沟浦遇到风暴，浪击舟破，因此，不得不登岸。潮水冲上岸来齐人腰部，鉴真坐在乌菴草上，别人都淹在水里，冬寒

风急，极为辛苦。这一次未能成行，停下来修理船只。大概过了一个月鉴真一行再度下海。风急浪高，离岸不久，船又触礁破坏，不得不再次上岸。水米俱尽，饥渴3日。风停以后有渔夫发现他们，送来水米接济。余姚太守把他们安置在鄞县阿育王寺。第2次和第3次东渡的企图又接连失败了。

鉴真从余姚到会稽、余杭、吴兴、宣城诸郡巡游讲律授戒，又回到鄞县阿育王寺，这个时候已是天宝三载（744年）。荣睿、普照两人为了邀请鉴真东渡，历尽千辛万苦，而“坚固之志曾无退悔”。鉴真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派僧人法进和两名随从携带“轻货”到长乐郡去买船，并备办粮食和用品，筹划第4次渡海。鉴真自己率领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他们以巡礼佛迹为名，向南进发。经过临海郡的宁海，到唐兴巡礼天台山，以后，又经临海、黄岩等县，准备南下到永嘉郡。这个时候留在广陵的鉴真的弟子灵祐等人，以为“我大师和尚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有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这批信徒出于对大和尚个人的爱护，不愿他远适异域，因此申请采访使劝阻鉴真不要过海。采访使派人追踪到临海郡，把鉴真迎回广陵，并且下命：“防护勿令更向他国”。各地信徒听说鉴真又回到广陵，都来庆驾慰劳。可是，鉴真却忧愁不已，特别不满于策划阻挡他过海的弟子灵祐。灵祐为求得鉴真的宽恕，每夜从一更立到五更，如是者60天，各寺僧人也共同替他说情，鉴真最后才宽恕了他。第4次东渡的计划就这样又成泡影，然而鉴真的决心未因此而动摇。

天宝七年（748年）春天，鉴真与荣睿、普照计划造船，购买香药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作第5次的尝试。

同行僧俗水手一共35人。阴历六月廿七日从广陵新河向南过江，入江南河，从晋陵郡到会稽郡，停住一月，等到好风以后入海。到暑风山，又停住一月。然后十月十六日再启程。“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从皆慌醉，但唱观音”。又经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等，以后“有急风高浪，众僧恼卧。但普照师每日食时行生米少许与众僧，以充中食。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碱水，腹即胀”。他们出海后14日，然而，没有到达日本，却漂流到海南岛南部的延德郡（振州）。别驾冯崇德设斋供养，安置在郡治的大云寺内，这样，住了一年，冯崇德派人护送鉴真到万安郡（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鉴真住在他家，供养3日。向北到珠崖郡（崖州）游奕大使张云出迎拜谒。鉴真在珠崖郡主持建筑佛殿讲堂砖塔，又造释迦木像。登坛授戒，讲律度人。然后从澄迈县登舟，过琼州湾到海康郡（雷州）。《东征传》载，再历罗州（招义郡）、辩州（陵水郡）、象州（象郡）、白州（南昌郡）、儋州、藤州（感义郡）、梧州（苍梧郡）、桂州（始安郡）。鉴真一路都受到礼拜供养，为各郡人授菩萨戒。在始安郡留居一年，五府经略采访大使南海郡太守卢象昇派人来迎鉴真。鉴真一行从始安郡乘船沿桂江东行，七日抵达苍梧郡，再到高要郡（端州）。荣睿在高要龙兴寺逝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已毕才上路。到南海郡后住在大云寺，登坛受戒。住了一春，向始兴郡进发，此时，已是天宝九年（750年），普照从始兴辞别鉴真，向东北径赴余姚。鉴真和普照握别时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无喻！”鉴真在南方频经炎热，眼瞎得病。经胡人治疗不愈，双目因而失明。

鉴真过了大庾岭，沿赣水到南康郡。到庐陵郡时，第一个支持追随他东

渡的祥彦不幸病死。后鉴真一行又入浚阳郡，受到信徒的热烈欢迎。3天后又沿江东下江宁县，住龙兴寺。这样，从海南岛北归，经历10余郡。

天宝十二年（753年），遣唐使藤原清河等请玄宗派鉴真和弟子5人到日本传戒。可是，玄宗想把道教传日本，要使臣同时邀道士东渡。藤原清河等因日本统治者不奉道教，而不愿邀请道士，因此，便建议留下春桃原等4人在唐学“道士法”，这样也就不便再奏请鉴真等渡海。然而他们向鉴真表示：“愿和尚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尽管广陵道俗都想挽留鉴真，不愿他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冒风涛之险，龙兴寺也“防护甚固”，可是鉴真决心东渡传戒，一切阻挠困难他都在所不计，最后终于在这年阴历十一月十五日 and 法照等乘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舶东渡，廿一日东南漂到阿儿奈波岛（冲绳）。十二月六日启碇，七日到益救岛（屋久岛）。十八日离益救，十九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廿日抵九州南部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日本朝廷遣使迎接慰劳。次年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年）二月，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平城京（奈良），住在东大寺，受到僧俗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官吏百余人来礼拜慰问。孝谦天皇宜诏说：“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

这样，鉴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经受百般磨难，历时10年以上，6次努力才最终实现东渡日本传道的宏愿，在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留下了感人的一页。这时的鉴真已经是67岁的人了。

鉴真对于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推动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日本佛教没有建立授戒的办法，很多僧人风纪败坏，不能清修律己。鉴真在奈良东大寺立坛授戒。天皇诏书里说：“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天平宝字三年（759年），鉴真又以朝廷所施备前国水田一百町的收入和给他的园地，在奈良建立唐招提寺，作为传戒的中心。鉴真所学以律宗为主，日本的律宗从此建立。他的弟子如宝等以后都成为有名的“律师”。鉴真东渡时也带来一些天台宗的著作，他自己和他的弟子也讲授过天台宗经典。

同鉴真一起东渡的有扬州（广陵郡）的法进、台州（临海郡）的思托、衢州（信安郡）的法载、泉州（清源郡）的昙静、襄州（怀德郡）的法成等僧人，有藤州（感义郡）的尼智首等3人，还有扬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一共24人。鉴真和他的弟子们不仅在日本传授戒律，而且介绍了中国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唐招提寺的殿堂是在他们亲自设计和指挥之下建成的。其中的佛像有的是鉴真从中国带去，有的是到日本后雕造。殿堂和佛像还有安如宝和军法力参加修造，因而西域和南海的佛教艺术风格也被介绍到了日本。

鉴真对于日本人大藏经的校正和药材的辨别，也作出了贡献。菅野真道等所编《续日本纪》卷二十四云：“于是有敕校正一切经论，往往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尚谙诵，多下雌黄。又以诸药物令名真伪。和尚一一以鼻别之，一无错失。”鉴真不仅精于药物学，而且也通晓医道。他曾替皇太后（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治病，取得良好效果。《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有《鉴上人秘方》一卷，是鉴真对于日本医学的贡献。

鉴真到日本后过了10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五月圆寂,年76岁。

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的时候，皇帝为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任用范仲淹为宰相，实行新政。范仲淹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文学家，曾写过《岳阳楼记》等传世佳作；但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他的新政没有取得成功。

宋仁宗做了 40 年皇帝，虽然也用过了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

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农业萧条，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可是政府的开销却成倍地增长，再加上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的银绢，这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宋朝统治面临危机。

宋仁宗死后第四年，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 20 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不景气的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公元 1021 年出生在一个地方官吏家庭。青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游历大江南北，对民间的情况比较了解。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 22 岁中进士，一生仕官生活中，南北奔走，任职地方，俸禄不丰，子女 8 口，日子并不那么好过。他常以古今治乱之道教育儿女，从小激发孩子忧国之心。王安石任官后，所以能做到关心民瘼（疾苦）国事，并敢于以治天下为己任，不能不说这是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记性特别好。他 17 岁那年初夏，跟随父亲到了金陵，思想开始趋于成熟。在如何对待人生、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他的认识有了重大发展。后来，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诗》这样写的：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志将安归？

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唏。

（稷和契都是上古时候著名的政治家）

17 岁的王安石在那士子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潮流中，希慕远古先人契和稷，不务虚名，立下了学以致用、干一番经世治国大事业的远大志向，由此奠定了他日后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奋战一生的思想基础。安石读书有了新的境界，视野开阔了，不耻下问，接近民众，对社会问题有了较深切的体会和认识，对下层人民疾苦有了真切的感受。王安石日后当政，之所以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符合下层人民利益的政策，原因在此。

宋仁宗宝元二年，王安石 19 岁的时候，父亲王益因病去世，王家一下子衰落下来。王安石首先必须挣钱养家糊口，孝敬老母亲。他明白自己只有去参加科举考试，求得一官半职，才能首先养家活命，然后再治理国家，为民造福。抱着这个念头，准备了三年之后，他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一举中第，名列进士第四，真可谓是少年春风得意，一朝金榜题名。

不久，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官，然后又被调到鄞县去任知县。（鄞县在今浙江宁波市一带）。

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的时候，一面利用一县之长的权力，为民兴办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一面深入考察，解剖通过鄞县这一地方反映出来的实际问题、社会问题，思考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他亲自视察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农田水利设施。听老农讲，由于这儿长期未修缮河道，许多年来泥沙将河道淤塞满了，河水经常泛滥，灾情时常发生。于是，他立即派人勘查清楚河渠情况，制订出详细而合理的工程计划，然后组织当地农民利用农闲疏通河道、兴修水利。当时农民的生活很苦，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总要忍饥挨饿。王安石下令在这时候把县仓的存粮借给生活困难的农民，等秋收以后，再按照所借的数量，加入少量利息偿还给官府。这既可救济贫困的农民，又使农民免受了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而且还使官府里储存的陈粮经常换成新粮，一举三得，既利国又利民。这一英明的措施，充分体现了王安石杰出的政治才能，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王安石身在下层，问题看得真切。他看到造成北宋“积贫”的重要原因不只是“费出之无节”，更重要的是“理财无术”。他把开源，即发展生产作为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根本。这个见解为王安石以后变法、制订理财方针奠定了基础。

王安石当了将近 20 年的地方官，做了许许多多对农民有利的事。在地方当官期间，他的变法思想也逐渐形成了。

嘉祐三年十月，王安石 38 岁，被朝廷任命为中央三司度专判官（中央最高财政机构官员）。那时，改革呼声并没有完全沉寂下去，在社会需要面前，王安石又站了出来，向神宗提出了改革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法先王”的旗号下，改革制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对外，不能不怕“夷狄”；对内，统治宝座不稳，天下财力日益困穷，风俗衰坏。他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现行的法度不适用，必须改革。打出效法先王的旗号，目的在于改革法度时，不至于使天下人惊骇，这其中蕴含着王安石为适应现实情况而作出灵活决定的意图。

二、要改革，须以整顿吏治，培养人才着手。

王安石认为，目前的官僚队伍太冗太滥太贪，依靠这支队伍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至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要做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提倡学习一些有用的可以治理国家、增强国力的学问。

“万言书”虽未包括他日后变法的全部纲领，但奠定了变法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万言书呈给仁宗皇帝后虽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但显示了王安石的全部改革路线：依靠皇帝的权力，整顿现有的官僚机构，制定一些能够适应和应付当前局势的法度，从而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一句话，利用上层建筑力量，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治平四年，即公元 1067 年，神宗即位。宋神宗是个年轻气盛、想干成一番大事的、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直敬重王安石的才华与胆识，即位不久，就任命王安石做江宁府知府；不久，又调他到京城做了翰林学士；接着又打破常规，直接召官职很低的王安石进宫，与皇帝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王安石一下子得到神宗皇帝这么多额外重视，引得许多朝廷中的老大臣嫉妒不已。副

宰相唐介就到处宣扬“王安石是小人得志，千万不能让他主持国家大事，否则国家所有的法律都将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王安石到了开封，宋神宗很快召见他，问道：“宋朝开国以来，祖宗守天下，能够百年之久，没有大的变故，保持太平，用的是什么办法？”

王安石经过认真思考，写了一篇奏疏。他在奏疏中说，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所以，国家衰弱，人民贫穷；幸好现在在我国边境上没有大事，国内没有大的灾害，这才保证了大宋政权自开国以来百余年没出现大的变故，朝廷自上而下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危机。但是，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如今皇帝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希望陛下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王安石已经感到了变法之难，然神宗坚定地对王安石表示：“尽管他人不能真正了解你，但我深知你的学问与为人并非自今日始。我之需要你正如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神宗的信赖使王安石十分感动。他充满信心地说：“刘备、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能为尧舜，左右必有稷、契充当助手。”从神宗殷切期待的神态里，王安石感到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已经来临了。应神宗的要求，王安石继续阐述自己早已形成了的变法思想。神宗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王安石的主张好。宋神宗高兴地说：“这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想让你帮我改革朝政，想来你不会推辞吧！”王安石怕宋神宗以后变卦，就说：“陛下真要用我，不必过急，请先听我讲学吧。”

王安石想利用儒家经典讲述他的变法主张，来坚定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宋神宗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你很久了，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停了一下，又问：“变法应当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排除了廷臣们的反对和阻挠。大胆地把王安石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做参知政事二年。便被神宗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之职）。在任宰相期间，他辅佐神宗厉行变法，掀起了前后持续16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死结束。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是变法的主要谋士和实际支持者。

自古变法多险阻。熙宁变法涉及面广，对大官僚地主、富商既得利益触犯又深，因此它遭到了激烈反对。守旧派矛头又不敢指向神宗皇帝，而王安石则成为合力攻击的靶子。在与气势汹汹的反对派（后宫势力为其后盾）的斗争中，王安石显示了一个伟大改革家所具有的过人的胆识、智慧、辩才、能力和勇气。鲜明地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是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与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蜚语，毫无畏缩，依然敢作敢为。副宰相唐介在与王安石关于变法辩论中，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发背痛而死。王安石被命为参知政事后，守旧派更加惊恐。御使中丞吕海急不可耐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罪状”上告神宗，说他是“大奸”，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王安石做事大公无私，把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公布出来，从来不搞阴谋诡计，何来“奸”与“诈”？再说王安石刚入政府几个月，何来“十大罪状”？吕海的攻击，仅是一个开端，在变法中，随着新法一项项颁布，造谣、中伤与诬蔑直指王安石而来，他却坦然处之，说：“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

他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让大家去说吧！“人言固有不足恤”，这是王安石的名言，也是他进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我国古代，对地震、山崩、星变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一旦发生这些自然现象就往往认为这是上天在惩罚人类。于是，那些守旧派为了破坏变法，用灾异天变来进行攻击。神宗虽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但他是不能公开违抗“天”的意志的。保守派正是抓住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向年轻的神宗皇帝灌输“天命可畏不可违”的思想。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慧星出现。慧星在古代被视为“妖星”，反对派便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声浪。神宗忧心忡忡。为此，王安石曾带了一些人专门就天变与人事关系和神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他处在那样的时代，那样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勇敢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的口号，保守派利用天变破坏变法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宋代帝王有恪守祖宗家法的传统。守旧人便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口号，妄图以此恫吓和镇压神宗和王安石。王安石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学问家。他精通历史，发现没有一朝王法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响亮地提出了“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战斗口号。

但是以曹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联合起来上书神宗，要他罢王安石的官，将他逐出朝廷。面对巨大的压力，王安石并没有退缩，他根据历史事实，从容地向年轻的神宗加以解析：“仁宗在位40余年，曾有好几次修改过法令。如果说法不变，子子孙孙当世世守成，那么，为何祖宗屡屡加以变动？”这番陈述精辟有理，使神宗信服。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三不足”的响亮口号，成为王安石变法革新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这个目的，陆续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些属理财富国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属于强兵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王安石制定新法的出发点是把便民与富国联系在一起，至于实际的执行程度是另一回事。改革初期，新法由新创建的条例司颁布下去，命令各地严格按照法令执行。

这个新创建的条例司全称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通过这个机构，将新制订的法令颁布天下。新法的具体内容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法：

一、青苗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谷物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使农民避免地主豪绅的高利盘剥。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

二、募役法，或称免役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颁布。规定改差役为募役（用钱雇役）。具体做法是：原有差役负担的人，按田亩多少分等交“免役钱”；原来没有差役的人户（享有免役特权）一律按田产数交“免役钱”之半，官户后来又减少到了1/4，但按家产纳钱的规定不变。家产越大，须缴纳的免役助役钱越多。这样朝廷的收入增加了。到1076年，北宋政府收入役钱（除雇役支出）为400万，都入了国库。废除免役特权，对兼变及官户也起了抑制作用。募役法是此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是王安石最为得意的一项新法。

三、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熙宁二年（1069年）十月颁布。

王安石任相后，派人专门分赴各路考察农田灌溉、徭役利害等情况，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参照前代兴修灌溉工程的知识经验，制订和颁布了《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共修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按高下分派。不足部分，可依青苗法向政府贷款，取息一份就够了。朝廷由此可获薄利。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使农民直接受益。法令颁布后的头7年，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1万多处，可灌农田3600万亩、官田20万亩。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10家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凡家有两丁以上，出一人作保丁。农闲时集保丁练武；平时，每一大保规定5人轮流值夜防盗。王安石还计划把保丁练成民兵，逐步代替募兵，即以征兵制代替募役制，以此改革冗兵之弊病，为国家节省巨额经费。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从保甲法可窥一斑。

六、均输法，颁布于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规定朝廷向东南六路征调财物的征调权统归发运使，由其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情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从而打击了商人操纵奇赢、牟取暴利，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可惜的是，由于反对派反对，此法推行不久就废除了。

七、市易法。在京师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又在全国19个较大都市设立市易务。由国家出资，市议司（务）平议价格，收购因富商大贾操纵物价商旅不能脱销的货物，再以地产、金帛为抵押，让普通商贩购进行经营，年息二分。这样，政府掌握了议定物价权，打击了垄断市场的富商兼并势力；政府收入增加了，商旅和城市商贩也有利可图。

八、置将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发布。针对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的局面，置将法划定禁军防守区，不再将军队调来调去，并规定由固定的将官对禁军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置将法首先在北方和西北方地区推行，加强了边防力量。

另外，为了培养更多的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王安石改革了人才选拔制度。他深刻认识到，要对社会加以改革，必须培养从事改革的人才。王安石执政以后，更增加了培养改革人才的迫切感，把以诗赋为主录取的科举制度，改变为专以经义、策论取进士，同时废除了明经诸科。

学校也进行了整顿。首先是改组太学（最高学府），把反对变法的学生统统罢退，委派陆佃等变法派支持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1000人。

为了统一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发展，王安石亲自编定各级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凡科举应试解经注义，都应以它为唯一标准，从太学到县学，都奉之为教材。

新的贡举法和学校改革，抑制了反对派的舆论，有利于培养矢志改革的人才。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全国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1万多处，灌溉的土地达到3600多万亩，使人民得到了好处，国家增加了收入。如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许多，国家有能力支付20年的财政开支，这在变法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加强边防方面，熙宁五年（1072年），即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

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幅员两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久陷 200 年的旧疆重归，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仅有的。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

可是，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变法，咒骂王安石。

当时，正赶上有个地方发生地震和山崩，保守派把这些事情同变法联系起来，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不当，所以老天爷发怒了。有的地方发生旱灾，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罢免王安石，天一定落雨。”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他说，灾害是自然现象，不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只要做法正确，就不怕别人议论，用不着顾虑；祖宗的成法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两个太后——仁宗的曹后和英宗的高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拚命攻击新法，她们哭着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把天下搅乱了。”

由于保守派的势力非常强大，反对十分激烈，最后，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也逐渐动摇起来。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 1076 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从此，就没再出来做官。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执政，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掌握大权，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北宋失去了难得的“中兴”的机会，从此加速走向了下坡路。

